

建构、场域及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何少娴 尤泽顺

摘要: 布尔迪厄的哲学社会学是一种超越主客体对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元论学说。从历史维度的剖析表明,其建构主义结构观成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场域和惯习的讨论启发批评话语分析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话语事件这一具体场域,其符号权力学说为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符号权力”“合法性”“权威”等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关键词: 建构主义结构观; 惯习; 场域; 符号性权力; 批评话语分析

DOI:10.13658/j.cnki.sar.2017.06.028

作者简介: 何少娴,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尤泽顺,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7)06-0226-07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力图通过分析语言使用揭示内嵌于话语中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变革,是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语言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际研究中,它借鉴和融合了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中的各种概念和理论观点。^①本研究从历史维度剖析了布尔迪厄建构主义的结构观、场域理论、惯习、符号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等如何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互动框架提供思路。

一、建构主义的结构观

整体来看,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最重要影响是其主客一体、互动转化的建构主义结构观。其核心是通过考察客体如何在主体实践活动过程中内化为主体本身并反过来指导主体实践活动这一思路来解决西方哲学长期以来的主客体对立问题,由此提出一种超越主客体对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该视角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

基金项目: 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认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A1303);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话语与福建区域形象的修辞构建”(项目编号:20140B070)。

^①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3.

社会互动框架提供了思路。

布尔迪厄主张一元论是因为他发现传统二元论哲学各个流派都是仅从自己的角度观察世界,其结果往往片面极端甚至相互矛盾。20世纪初法国哲学界两种主要传统^①实际上是对以往西方二元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视角同样存在局限性: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关注经验、知识和主体性,主要考察知识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列维-斯特拉斯的结构主义关注知识本身的历史和科学哲学传统,主要考察独立于主体的科学知识结构与理论。对于前者,布尔迪厄赞赏其“个人在社会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的观点,^②同时对其将个人及其行动与社会结构分离开来的做法提出批评,因为将个体作为分析单元是把个人自由意志当作对实践问题的探索方法,忽视了行动者是从自己所处的一定社会空间位置来划分和建构自己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完全抹杀了行动者的社会性。^③对于后者,布尔迪厄同意其“社会是一种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的客观结构,它对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但是,其对个人的能动作用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却导致理论概念和实践现实之间的脱节,如“唯智主义”把“现实的模式”与“模式的现实”互为颠倒,没有意识到客观主义模式只是在表面上客观地描述了实践,它不能代替实践行为本身。^④为克服上述问题,布尔迪厄运用“社会现实既存在于个体之内、也存在于个体之外,既存在于心理中、也存在于事物中”^⑤的“建构主义”观点对“结构主义”进行改造,形成将结构和行动者、主体和客体等联系起来的一元论——“社会实践理论”。可以看到,布尔迪厄虽然试图借助建构主义观点弥合个人行动和结构之间的鸿沟,但是,从本质上看,他还是赋予结构以优先性,因为他曾指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及其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⑥社会学研究首先要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其次才是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⑦

布尔迪厄吸收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等有关思想,提出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融合的途径是:在社会实践(游戏)中,各种社会规则嵌入或内化到行动者的身体内,成为其身体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其行为的一部分,结构和行动者由此形成一种互为渗透、建构和生成关系,即所谓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具体来说,在个体行为者参与实践之前,社会结构已经先于行为者存在,行为者一开始参与实践就已经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但是,行为者在实践前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是以一种前对象性、非设定性的实践感从现有的状态中解读现有场域里蕴含的各种(包括将来的)可能,并根据自己的位置不断构建出对世界的理解,采取相应的行动;行为者在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规则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社会结构。

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讨论(特别是费尔克拉夫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来看,布尔迪厄一元论的建构主义结构观的影响主要包括: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的优先性、实践的中介作用。首先,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与社会之间互为建构。费尔克拉夫在其话语分析模式里明确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各类型实践活动)和社会事件(具体实践活动)三个层面,在话语层面上则分成与之相对应的话语结构(话语秩序)、话语实践(各类型话语实践)和话语事件(具体话语实践)三个层面,其社会结构显然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没有太大区别,社

① Foucault, M: Introduction. In R. S. Cohen (ed.). 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Dordrecht: Reidel. 1978: ix - xx.

② 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1967: 11.

③⑤ 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④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⑥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⑦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会实践也与布尔迪厄的实践相似,社会事件(具体实践活动)则是指具体个体行为者参与的某个具体实践活动,其含义相当于布尔迪厄讨论的行为者。在话语层面上,费尔克拉夫借用福柯的“话语秩序”来指代话语结构,同时将福柯提出的“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观点与布尔迪厄的社会结构与行为者双向互构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话语与社会现实具有辩证的互动关系”这一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核心立场。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同样赋予结构以优先性。批评话语分析的许多观点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如“话语在受到社会结构限制的同时,也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及“社会结构限定了话语实践活动,它同时也是话语实践活动的产物”^①都指出了结构优先于具体实践活动的特点。有些学者没有明确使用社会结构一词,但其相关论述对结构的优先性也表示认同,如范戴克认为,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客观结构,不会对话语产生直接影响,能产生影响的是行为者以客观结构为基础在主观层面上形成的“语境”,即那些行为者认为与当下话语生产直接相关的社会情景因素,^②这就是说,他承认存在一个可能对话语生产具有潜在影响的先在的客观结构。沃达克认为,当下的话语生产往往通过对历史话语(historical discourse)的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ed)来表达一些难以明确表达的内容,话语分析必须回溯到话语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彻底揭示其中潜藏的权力关系。^③她的“历史话语”和“历史文化语境”其实就是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秩序”的一部分,也即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再次,具体话语实践是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连接的中介。个人具体话语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社会结构的规约,或者说,必须将社会结构的相关规则运用于其中,然后才能结合自己的交流意图和语言表达能力及特点进行个性化生产;生产的话语一旦被接收并理解,它就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规约产生能动作用。如“一带一路”是中国以世界历史中关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话语为基础,结合当下中国及世界具体社会现实生产的新话语,现在已被许多国家理解并接受,改变或部分改变他们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的理解。

二、惯习与场域

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第二个影响是:他对“惯习”和“场域”的讨论为批评话语分析指明应把考察分析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场域)而不是个体行动上。

所谓“惯习”(habitus)是指一种“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的功能”。^④换句话说,惯习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性情倾向,是社会结构在行为者身上内化形成的一套主观结构系统;这种主观结构系统还能在未来的实践活动中指导行为者的行为,最终达到行为效果;不管是系统的内化过程还是指导过程,行为者都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来完成。惯习之所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主要在于它是一种时间性结构,是历史和未来事件发生联系的中介。它脱胎于历史,包含了历史当中的各种感知、行动和生活方式并使之得以存在和延续。同时,作为后天习得的东西,惯习已经内化为行为者的内部结构,成为类似于先天结构的性情倾向;就像其他先天结构,如心脏或神经系统等自然而然地跳动或作出反应一样,惯习也是无意识地、自

①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37-38.

② van Dijk, T: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Wodak, R. & Meyer, 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2009: 1-33.

④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

由地、创造性地在实践中发挥作用。^①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在时间上一直存在并延续,社会结构在主体内部的结构化以及结构化的内部倾向系统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就是自然而然的。正因如此,人们在实践中的行动能够“本能”地与环境相适应,不需要经过理性的选择,也不是被动地遵循环境强加的行为规则。

然而,“惯习”作为一种个体行为并不是独立的,它往往存在于“场域”中并在其间发挥作用,因为权力斗争不可能发生在行为者作为个体的身上,它只发生在行为者作为实践者并采取相应行动的那个场域里,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②正是在场域中,个体的位置及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了界定。社会世界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一个一个的场域,它们是具有自己独特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但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世界在生成结构上存在同源关系(homology)。场域是那些参与场域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与周围社会经济条件之间一个关键场所。首先,场域是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游戏的场所和权力的斗争场所,进入场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本;其次,场域造就个人的惯习,个人以惯习作为资本进入场域参与游戏和斗争,在此过程中,场域可能被型塑甚或发生变化;再次,场域及发生于其中的一切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学校教育体系、国家、教会、媒介宣传等被阿尔都塞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都是场域。不同的是,阿尔都塞是用静态的眼光从外部来看待社会结构的共时框架,将之视为一种根据既定规则程序形成结构内部的运作,类似于机器的机械运动;布尔迪厄则将之视为动态的关系网络,行动者主动参与并具有创造性,行动者在受场域制约的同时,仍然保有改造建构场域的倾向和可能。^③

对于场域的研究,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分析三个环节:首先是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是勾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他们通过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给以内化而获得的倾向系统,也就是说要厘清大社会和小场域、结构和行动者、行动者惯习与场域等三个层面的关系。他坚信互动应是发生在被结构的场域中的互动,互动分析不能脱离场域。

纵观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讨论后可以看到,批评话语分析完全接受布尔迪厄的上述观点。首先,批评话语分析认为,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中的互动是社会学分析重点”的观点表明批评话语分析必须以“结构”为研究导向的特点。因为场域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话语秩序”(是整个社会话语秩序在小场域中的体现),批评话语分析使用的相关结构构式“不能是一种单独的话语秩序,而应该是一种处于场域或跨场域的话语秩序的被结构化构型”(structured configuration)。^④其次,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为社会关系提供一种图表式的描述或分类,从具体侧面和实证层面对那些描述时空关系的总体社会理论进行研究(即把抽象的理论描述和具体的实证研究连结起来),从研究设计来说,批评话语分析还可以开展更为大规模的具体(包括民族学方法的)的实证研究。再次,布尔迪厄对于场域关系、结构和惯习的粗线条描述为批评话语分析进行具体话语实践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比如,在研究某个场域话语秩序的界限和变化时,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从分析某个问题出现的场域开始,研究某种特定的交流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将一系列话语实践资源混合运用起

①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第133页。

③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3.

来,用于维护或改变现场的话语秩序的界限,社会现实在话语层面上如何因为话语秩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它还关注一个话语实践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如何发生联系以及不同话语秩序是如何发生关联并将一系列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①最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表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本人不仅是观察者或置身于实践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场域中的某个行动者,如斯科隆^②在研究“打太极”和“学汉语”时,就将自己置身于实践节点之中,考察具体场域中实践活动参与者的“历史个人”(historical body)、建立彼此现行关系的“互动秩序”(the interaction order)、参与者使用的那些使活动得以发生的“在位话语”(discourse in place),以此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贯彻了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也使民族方法学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运用。

三、语言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哲学社会学思想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第三个影响是:其符号权力学说不仅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说明了语言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及其如何发挥暴力手段无法发挥的作用,还为后者如何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

布尔迪厄提出符号权力学说是为了揭示场域中语言交流与权力支配的共谋关系。为此,他把语言从形式主义视角下的封闭符号系统解放出来,置于社会实践的场域,将其视为人们参与场域活动的资本和构建话语权的工具。首先,他指出,语言使用是人们最重要的惯习之一,是一套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的倾向。它以言语形式将行动者及场域的相关客观关系及相互作用呈现出来,各方在交流中通过话语施加影响,获取利益,形成一种有别于战争或暴力反抗/镇压的非物质性符号权力斗争。语言惯习只是行动者惯习的一个侧面,将语言实践放在各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就能更好地得到理解,因为行动者的其他惯习都是通过语言惯习表现自身的。不仅如此,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权力的关系,“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现出来……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以及他们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络”。^③

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布尔迪厄对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语用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通过赋予语言的内在逻辑以特权,将语言看作一种与社会实践无关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剥夺了其实践功能和政治功能,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好像一个人只要掌握语言规则,他就具有语言能力,就能在实践中使用得体的语言,而现实的情况是不同人在同一场合使用同一语言时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乔姆斯基表明人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但他仍然没有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割裂语言系统与其社会实践功能之间关系这种为编撰整理语言而理解和研究语言的做法,他通过“把合法话语的内在规律转化成了恰当语言实践的普遍规范”来达到避开“关于合法能力之获得及市场之建立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问题”。^④可以说,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孔德(Comte)的“语言共产主义”错觉上,即把语言视为

① Chouliarakis,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3.

② Scollon, R. & Scollon, S: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3. Nexus Analysis: Discourse and the Emerging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2004.

③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第189页。

④ 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页。

一种财产,所有人都可以同时使用,又不会使其储备减少,还可能在无意中促进它的保存,也就是说他们错误地排除了语言交流存在任何形式剥夺的可能。奥斯汀虽然把目光转向了语言的社会使用,并指出语言效力来自于制度条件,然而,他力图从“以言行事的表达式”中寻找效力的来源,没有意识到语言权威来自外部,制度授权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世界的制约;符号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处于一种确定的权力关系中且为其所确定;^①符号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取决于那些自身可能也臣服于权力且也在施展权力的人是否愿意合作。^②

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语言交流视为一种市场行为,指明言说只有在与市场发生关系才会产生价值。换句话说,语言的符号权力运作在于:一方面,人们以自己的语言惯习作为交换产品投入市场,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与他人交换语言产品,交换行为受到语言惯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交换行为还受到语言市场诸种结构的影响,它们通过把自己作为特定律令和审查制度的体系而施加影响,特别是它们通过决定语言产品的“价格”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更新。^③言语行为者通过将自己的语言惯习及其负载的社会结构(包括性别、教育水平、阶级地位、出身等)展示给市场来获得价值,市场则利用自己的约束和监督体系来为语言产品“定价”。表面上看,语言不是一种稀有商品,也不会因为分享而使其资源减少,但是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是很不平等的,每一次的语言交流实际上都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当交流所涉及的行动者在相关资本分配中占据着不对称的位置时,情况更是如此。

布尔迪厄强调,语言与权力共谋的关键在于“合法性”(legitimation)和“授权”(authorization),即市场通过给予行为者的言语能力以“合法性”和对其“授权”,将权力转换为符号形式,行为者则利用这种“合法性”和“授权”在市场上争夺利润。“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的语言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语言,是为官方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是施事性的,是宣称为有效的(即合法的)。”^④除了授权外,权威话语还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以合适的方式说出来,尤其是必须由法律许可这样做的人说出,才能以一种貌似理所当然的方式被其他行为者所接受和认同而又不自觉,并因而真正产生其应有的效力。在市场监管与惯习培养、限制与遵循的双重作用下,占支配地位的行为者与受支配的行为者实现了言语交流,并掌握了交流的主动权,获取了更多的市场利润;受支配方即使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也只能遵循现有的市场规则而毫无办法。这样,符号权力实现了正常运作,占支配地位阶层的利益得到了维护,符号权力与社会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形成了共谋。比如,在政治场域,政治家通过民众授权而获得代表人民说话的“合法权力”,而社会制度(市场)则将他们的权力推到极点,使权力凌驾于给予他们权力的民众之上,造成权力的获得源自于政治家本人的才能和资本而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象,最后甚至连民众本身都相信这一点并对这种权力产生羡慕和崇拜。

通过将语言、惯习、符号、资本、市场、权力等联系起来,布尔迪厄成功建构了他的符号权力学说。该学说对批评话语分析互动观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他重要观点具有强烈影响。首先,

①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第189页。

②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Trans. by G. Raymond and M. Adams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版。

④ 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第53-54页。

批评话语分析关于社会现实与话语之间互动如何能够实现的整个推导过程基本上取自于布尔迪厄符号权力学说框架。目前,学界一致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坚持以批判为研究视角、以语言使用分析为中介的立场主要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思想,然而,哈贝马斯对两者之间互动的描绘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解释,没能表明他们之间如何能够运作;虽然言语使用被提到了中心位置,但是,言语行为似乎仅是一种交流的中介行为,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重视,也未能得到讨论。这给力图通过语言分析寻找话语与社会互构关系并以此推进社会变革的批评话语分析带来两个问题:话语与社会具体是如何实现互动的以及社会变化如何能够落实到微观层面的语言使用中。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学说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引进惯习,他把社会结构与日常的语言使用联系起来,说明符号性权力如何在社会世界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批评话语分析采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视角,把语言视为中介体,但是,它是通过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学说来解释结构和行为者实践之间的联系。其次,批评话语分析解释话语与社会如何互构的思路来自于布尔迪厄“惯习是结构和行动互动的中介”这一断言,不过,在具体理论构建时,批评话语分析用语言行为(部分惯习)取代总体惯习(总的性情倾向)作为结构与行为者实践之间联系的中介。其原因在于布尔迪厄虽然指出语言使用是行为者最重要的惯习,但并不认为语言在惯习的形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他说,“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惯习的形成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通过语言和意识,而是通过各种暗示被加以传递的”,^①这一观点与批评话语分析主张话语是研究的中心有所不符。因此,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讨论中,布尔迪厄的惯习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基本上只在其讨论场域时提及,而语言(也包括语言惯习)成为了整个讨论的中心。总之,批评话语分析运用了布尔迪厄符号权力学说解释结构和行为者实践之间的联系,但使用了语言行为(部分惯习)来取代总体惯习(总的性情倾向),以此说明语言使用如何在具体场域的权力争斗中发挥作用。再次,布尔迪厄符号权力学说中的“符号权力”“符号暴力”“合法”“权威”等概念也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被频繁使用,如费尔克拉夫就频繁地使用“符号权力”和“符号暴力”来说明语言使用的权力效果以及如何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潜藏其中的权力。^②奇尔顿也使用“合法化”概念说明其是政治行为者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去合法化”则是指责对手或敌人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③

四、结 论

总的来说,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对批评话语分析(特别是费尔克拉夫互动分析)具有重要影响。他的建构主义结构观成为批评话语分析构建话语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场域和惯习的讨论启发批评话语分析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话语事件这一具体场域;通过分析具体话语事件中的语言使用,并把具体语言使用与社会及历史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揭示具体事件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真实形态及其产生机制,为其更高的政治目标服务;他的符号权力(暴力)学说揭示了语言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及其如何发挥暴力手段无法发挥的作用,为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其中的“符号权力(暴力)”“合法性”“权威”等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① 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第28页。

②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3.

③ Chilton, P: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4.